

王光祈譯

三國干涉遼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三國干涉還遼秘聞

### (一) 日本議和條件內容與列強互相接洽情形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國全權代表李鴻章，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日本內海入口之馬關，開始預談和會問題。後以李氏被人刺擊之故，談判之事稍稍延滯。——因爲刺擊事件之結果，——於是日本方面對於允許停戰一事，最初本來附有強硬條件者，至此乃爲無條件的允許停戰。其後復因各方屢次催促，日本代表乃於四月一日，將議和條件正式向中國代表提出。其中除要求『高麗完全獨立自治』外，並要求割讓盛京南部，（原註：普通稱爲遼東）與旅順大連以及臺灣澎湖諸島。（原註：澎湖諸島在臺灣與中國福建省之間。）此外並須賠償戰費三萬萬兩。而且現時暫將山東省內威海衛一港佔領，以作賠款之保證。其餘要求條件，則爲開放若干通商口岸，給與各種商業利益諸事。

當此項條件消息傳來歐洲之際，其時列強態度猶能勉強一致，但堅決行動之心，

却未具有，蓋其時列強對於干涉之舉，均欲設法加以避免故也。其在俄國方面，則 Lobanow 侯爵（係正月新故俄國首相 Giers 之後任）曾努力與英、密通聲氣。而俄皇尼古拉自己，亦復嘗與（英使） Sir Frank Tascelles 始終聯絡。其在法國方面，則願附英、俄兩國驥尾。但法國在一方面對於臺灣割讓之虞，雖然不顧，而在他方面却與英國一樣，甚望德國參與其事。蓋法國之意，正有如（法國外長） Hanotaux 先生所云：倘若列強態度，能够保持一致，則將來對日行動，始有效果可言，云云。此外，無論何處，蓋無不希望此種昏暗局面，從速了結。至於俄相 Lobanow 之誠實態度，尤無令人懷疑之處。蓋彼於二月二十日，曾向德使言曰：『此外，我們直到今日，無不嚴守中立態度，正與君同。余並希望，我們能够繼續保持此種態度。』云云。Du reste, jusqu'à présent nous sommes neutres juste aussi bien que vous, et j'espère que nous pourrions nous maintenir dans cette position.』而且（英相） Lord Kimberley 亦嘗以爲『就（俄相） Lobanow 侯爵論調觀之，決不能推出，彼有出頭干涉中日事件之意，云云。』此語並非無稽之談。至於（英相） Lord Kimberley 本人之態度，據（駐英德使） Hatfeld 伯爵二月十一

十四日所報告，則謂：『英相並無十分傾向干涉之心。其所以如此之原因，據彼向余密告，則爲此間輿論對於斯舉，直到現在，均覺不甚贊同，故也。』云云。』輿論一物，實爲 Lord Kimberley 個人及其全部政府之行動方針！至若列強內部本不一致而表面猶能至今互相團結者，實因當時彼此均有一種隱憂在心，即是假使中日之間共結一種同盟，或者中國全爲日本所征服，則此後（黃色人種）勢將造成一種統一的，重大的勢力；倘歐洲方面若不互相團結起來，實無力加以對抗。但此種情勢，却又迫令各國自覺，非中國獲得土地若干，其勢不能穩固自己地位。而此種爭獲土地與其不可逆料之在結果，又有破壞列強聯合陣線之虞。換言之，即是一種不祥的循環。（沒有出路可言。）因此各國以爲：假如欲避此種循環局面，則只有力使列強在華勢力現狀，勿因日本和議條件影響，過於變動遷移之一法。柏林政府在此，遂遇一種巨大難題，不易決定。蓋該政府衷心希望東亞難關，速由一種正當和平，加以解決一層，固已於上述三月一日致與駐英德使之訓令中言之。現在的問題，即是假如此種難關並無和平解決之望，而列強擴張勢力之心，又復愈來愈盛，換言之，即將遠東方面，開始夷爲殖民地。如此，則德國



應該站在旁邊，以便一如從前非洲南洋情形，徒興機會，又誤來時又晚之歎嗎？其實尙不僅此，究竟德國對於世界政治前途，是否應該積極參加，取得一種相當地位，爲德國民族經濟力量分所常有？抑或德國應該聰明自足，只將雙眼注意本國所居地勢，時常皆在危殆之中；務須謹慎自足，但保現在所有；同時並將德國兵力集中，不宜移置遠處？如果德國參預東亞某種干涉行動，其結果不免偏親歐洲某國，或某某數國團體，則吾人預料柏林政府決定此種大計之時，仍將保持自足態度，不去參預。就一八九九年三月情勢而論，德國之謹慎知足態度，在當時具有重大海外利益之列強中，實爲唯一無二之國家，不願參預東亞方面歐洲列強共同行動者。而且德國此種態度，常違其他列強希望，尤其是英國希望。蓋彼輩均認德國最宜擔負調和之任，並能使列強共同行動爲之穩固，故也。其後德國政府決定方針之時，確受列強此種主張之影響不少。德國最初所抱態度之不能繼續保持，其實應首由日人負擔，已如前面所述。至於其他對此應該負咎之人，則將於下面敘述之中見之。

（德國）國務總理 Hohenlohe 侯爵曾上德皇說帖一件，其中有云：『我們政策

標準，在一方面，對於只與他國有利之行動，固然不應早期加入。而在他方面，則對於參加此類行動之權利，却當預爲保留。蓋此項行動能使歐洲列強之東亞勢力分配，爲之消長變動，故也。』此種見解與決定，實與三月一日致與倫敦德使之訓令中所言者，完全相同。德國當時既向倫敦方面，表示願與英國共同行動之意，現在事隔三禮拜之後，更向聖彼得堡方面，爲同樣的表示。三月二十三日（德國）駐俄代辦曾接柏林訓令，略云：『請君轉告（俄國外相）Lobanov 侯爵，謂君曾接柏林訓令，其中略言：我們對於東亞時局前途，亦復甚爲關心。我們對於俄國論點，亦復完全贊同。（原註：譬如主張列強應用外交手段，從速促成和議。）而且我們相信，東亞方面德俄兩國利益，並無衝突之處。因此，我們甚願常與俄國交換意見，或與俄國共採一致行動。』是月二十五日，柏林方面接得答復，略謂：Lobanov 對於德國此種通知，非常歡喜，並言彼亦甚願與英合作。云云。二十七日（德國）駐俄代辦又來報告，略云：『Lobanov 侯爵告余，俄皇尼古拉陛下對於我們條陳，欣然接受。該侯爵並謂，俄國甚望東亞戰事早日結束。彼更相信，我們亦具同樣目的。彼常與此間英使不斷的接洽，對於法國方面，亦復同樣融協。』

至於英國方面對於德國此種決定之態度，則駐英德使曾於四月一日報告柏林，略云：『（英相）Lord Kimberley 頃向余言，兩三日以前，駐俄英使曾來電報，略謂：據（俄相）Tolstow 侯爵之報告，（德國）欽命駐俄代辦曾向該侯爵聲稱，德國願與俄國以及其他各國，協力參加關於中日事件之行動，云云。又謂：Tolstow 侯爵對於德國此種通知，表示非常滿意，而且據該侯爵揣測，倫敦巴黎方面亦將接得德國此種通知云云。英相並向余言：當余今日謁彼之時，彼曾希望，余將向彼，作此通知，果爾則彼當十分歡喜，云云。』而在實際上，德國對於倫敦巴黎兩處，却始終未發此項通知。大概德國當時之所以未向巴黎通知者，實以法國方面當然附和俄國態度，故德國不必再作此種通知贅舉。至於倫敦方面之所以亦未通知者，則因當時柏林外部中心人物 Holstein 先生，對於英國政府之不可信賴，正在十分忿怒之際。蓋當時英國 Lord Rosebery 之飄搖政府，行事有如草莖，只隨『輿論』風向，轉移彎折而已。但柏林方面對於英國合作一事，終是認為必需，認為當然，吾人可於後此數日之舉動中盡量見之。誠然，要想倫敦軟性政治家之思想，堅持不變，乃是一樁極不容易之事，尤其是在緊要關頭之時。日人



方面最初堅持，在中國未曾承認停戰條件之前，決不宣布議和條件，云云。其時英國方面，不知究係出於自己動機，抑係由於華人慫恿，曾出頭邀約俄國政府，共向東京宣言：在議結停戰條約之前，先將議和條件向華宣布，實爲妥便。reasonable云云。於是俄國政府遵從此項英國邀約，乃賜給俄國駐日公使關於此事之訓令。同樣德國政府又因俄國方面之轉約，亦復賜給德國駐日公使關於此舉之訓令。反之，最使大家驚異不已者，即駐日英使却始終未得本國政府何等訓令，是也。其後（英相）Lord Kimberley力將此種不幸『誤會』設法解釋，其所據理由，則爲中國全權代表對於停戰節略，既已自願放棄，以便直接開始和議，其結果各國催促日本宣布和議條件之舉，遂成贅疣，云云。究竟英國此種辯釋，是否正當，儘可置之不問；而英國此種態度，却不能不使其餘各國大爲不懌，大爲懷疑。其在俄國方面尤甚，蓋（俄相）Tojanow曾向德國駐俄代辦言曰：我們之爲此舉，全係追隨英國提議，『以免我們與英分馳而已』。pour ne pas nous séparer de l'Angleterre。蓋共向日人表示，列強關於東亞政策實係彼此一致之舉，甚爲重要，故也，云云。至於（林柏外部方面）Holstein先生則更情不自禁，嚴責英

人，在最後一秒鐘之時，不應忽然跳開。英國此舉顯然有意對於凡使日人不樂之事，均欲設法加以避免。其結果只使俄國日益向法接近而已，云云。

在此動搖不安局面之中，日本議和條約適於是時宣布。其在柏林方面，則由日本公使Aoki於四月二日，通知（德國）國務員Marchall。該使對於割讓遼東一事，曾爲之解釋曰：『爲保證高麗獨立，以防中俄侵略起見，割讓該地之舉，實爲軍事上所必需，云云。』此外，該使向着（德國）副國務員Mullberg，則更明白宣言：日本非佔遼東半島不可。『旅順港口須成爲北洋海灣之直布羅陀（Gibraltar）』。俄國可以獲得北滿以及Posiet海灣。（譯者按，在滿韓俄三方交界之處。）英國可以佔領舟山羣島。『德國很可以在中國東南方面，佔有一個省份；此種佔有之價值，實遠較德國全部非洲殖民地之價值爲大。德國在該省之內，當可與其他列強，接洽妥當，』云云。究竟日使Aoki此種談話，是否奉有本國訓令？如其有之，是否全與訓令內容相同？我們對此均可以置之不論。惟該使此種談話，很難令人人鄭重視之。倘若有人向着該使提出下列問題：究竟彼所推薦之『東南省份，係指何省而言？是否即係臺灣對岸之福建？』吾料該使必定立

刻陷於狼狽情形。此外吾人更可用語提醒該使，彼所言及之 *Pootet* 海灣，其時早已屬於俄國，業有三十四年之久矣。

至於日使 *Mori* 此項談話，其影響於柏林方面者爲何如？吾人可於四月四日柏林政府電致駐英駐俄駐法三位德使訓令中見之：『旅順港口如果變成直布羅陀，則將使中國，至少將使中國北方與其京師，成爲日本之保護地方。此種誇大要求，將令中國國家繼續存在之問題，以及歐洲列強向華爭求土地之問題，立刻發生。其結果對於與此有關之各國，勢將釀成一種不可小視之戰爭危險。此外，余（譯者按，係柏林當局自謂）更有應向閣下密告者，即日人相信，假如俄國方面提出抗議，則即以北滿及 *Pootet* 海灣讓與俄國，作爲西比利亞鐵路之起點，如此當可運動俄國，取消抗議，云云。』其後柏林方面，並決定與（英俄法）三國政府，互相交換意見。其在英國方面，則見解正與上述相同，而效果却完全兩樣。（德國）欽命（駐英）大使曾於四月三日報告云：『此間認爲最大危險者，不在日本合併土地擴大疆域，而在中國政治方面或將從此全仰日本鼻息，其方式或用中日同盟，或用其他各種均可。如果日本能使中國輸入物』

質文明，發其無窮富源，而爲日本之用，則日本更將逐漸形成一個極大勢力，云云。英人既已看出此種危險，其自然結果，卽是：此間對於日本方面，雖然未增何等同情，但極努力設法，凡可以使日本對英發生嚴重永久不懌情形者，無不加以避免。『俄國大使對於英國此種深恐中日聯成一氣之隱憂，祇表同意。至於柏林方面對於此次事件之憂慮，大抵根據 Brandt 先生說帖。蓋 Brandt 先生曾於其間以顧問資格，參加此事之討論；並於四月八日作成此項說帖。彼對於日本之佔有旅順港口一事，亦復認爲極與中國獨立有妨。此外，彼對於此種屈服寡助之中華巨國，因環境的壓迫，不得不依附日本一層，亦復認爲極與歐洲有害。此項問題之政治方面，尤有應該注重者，則爲俄國在歐地位一事。倘若法國不與俄國共同行動，則法俄關係不免從此鬆弛。反之，假如法國贊成此舉，願意合作，則英國方面對此很難獨居例外，云云。該說帖又謂：此外，我們若與俄國共同行動，或者乃係唯一機會：卽我們可向感激不已之中國——關於中國感激一層，我們當然應該設法令其必須如此——要求割讓或出租一地，以作我們艦隊或裝煤之站口。所謂割讓或出租，名詞雖異，而在實際上當然是一樣的，云云。Brandt 先生最後

又引舉西洋各國歷來共同保護在華利益一事，收效至大。於是乃下一結句曰：『此種公共保護相同利益之制度，可以抵抗日本對華和議之過分要求，可以確立東亞方面之永久安寧，云云。』當時德皇思想，正爲『黃禍』二字所浸透，於是Brandt該項說帖，遂大爲德皇所贊成。此外，該項說帖並建議柏林政府，對於是日（四月八日）俄國遞來之條陳，宜表示同意。先是四月六日俄國駐德代辦曾向柏林政府聲稱：（俄相）Lo-banow侯爵甚欲一聞（德國）帝國政府對於現今時局之意見，云云。當時（德國）國務員Marschall對於此種探詢，乃答之曰：對於日本欲在大陸之上，割得土地一事，甚覺不妥，尤其是關於旅順方面。如果日本佔據該地，則日本控制中國之舉，勢將成爲事實。但黃色人種若在日本領袖之下，互相聯絡起來，則對於歐人利益，却極有關。因之，對於此事，似有彼此交換意見之必要，云云。又俄國方面對於倫敦巴黎兩處，亦曾作同樣之探詢。其後復由俄國駐德代辦於四月八日，將俄國陳遞與柏林政府，此項條陳乃係由交換意見進而爲共同行動之第一步驟。蓋該條陳主張：用友誼的態度，向著日本政府，表示歐洲列強旁觀之意見。略謂：『日本如併旅順則將爲恢復中日兩國友善關



係之一種障礙。而且東亞和平亦將永受其危。』

我們如欲明瞭俄國此種條陳在英所受之待遇情形，則我們必須先從數個星期以前說起。當二月底間三月初間之時，英國社會方面對於東亞問題之意見，曾發現一種驟然變遷之痕迹。蓋是時英國人士又復開始思慮俄禍；對於（東亞）時局，亦以此種眼光觀察。中國堡壘現在既已崩潰，究竟將來誰應填補此種防俄之任？可以語此者，只有一個日本。但英國方面現在對於日人，却已弄成一種深仇死敵關係。英報 *Pall Mall Gazette* 11月12日曾發表一篇憂形於色之論文，其中有云：『此實爲時局前途之不良徵候。倘若日本竟與俄法諒解，而以中國爲其犧牲之品，則英國究將如何？誠然，英國方面亦可分得一部掠奪，但是緩衝地帶却從此因而喪失。向使英國前此舉動聰明，則今日當可屬於日本盟友之列，云云。』於是英人遂以其素具之政治天才，將其政策，悉行改照此種方針而行。在三月十五日俄報 *Novoje Vremja* 之上，曾載有一段倫敦消息，略謂：英國社會，忽然之間，對於日本一切事物，均感非常興趣，曾開日本圖畫展覽大會。此外，設宴慶賀日人之舉，亦復不少。倫敦人士顯然發生一種有利於日之

意見變遷。而且彼等對於日人統治中國一事，亦復認爲可能。吾人對於英國社會此項意見變遷，頗有注意之必要。蓋此種變遷實受有政府方面影響。因政府方面對於某種計畫，似已成熟，或將要成熟，故也。云云。『從此時起，英國報紙遂明白表示：英國政府意向之所在。三月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曾登載一篇論文，言係寄自東京，而實際上當是係在倫敦作成。文中曾指日本政府，宜防一個欲想報仇而又能報仇之中國爲其隣居。並謂：『日本必須造置一種防禦鐵甲，以防此種可能之事。或者日本將在遼東半島之上，以尋此種鐵甲。日本既據該地，則對於一部分北洋海灣可以控制，遂將中國侵略高麗之基礎，從此奪去。西洋方面對於此種和議條件，很難加以拒絕。云云。』文中所謂『西洋方面』，在英人宣傳用語中，其意即係『英國』。至於文中所謂『中國』，則宜改作『俄國』。誦讀該報在二月七日之時，猶提出一種恫嚇略謂：『歐洲當不允許日本，能在大陸之上，合併一寸中國土地。云云。』而現在却向戰勝之日本，提出此種建言。倘若該報未在東京方面，已經得有一種穩確基礎，則二月七日與三月十五日兩種思想之懸殊，實未免太大。三月十八日英報 *St. James' Gazette* 更遠矚將來，下筆言曰：『

設如日本意欲成爲第一等強國，歐洲方面實無法加以阻止，英國政策必須承認事實，方求所以心安意滿之道。日本佔有許多年日，不能爲我之害。我們對於日本在太平洋之艦隊問題，實無須加以反對。誠然，俄國方面必將深感日本壓迫之危，但此事與我們何關。倘若日俄兩國高興，大可以去打一仗。至於我們方面，則是假如日本能去抵抗那種一臂掩盡亞洲北部之可怖國家，對於我們實無害可言。……我們毋須設法維持現狀，因現狀業已不復存在，故也。我們只顧狀況變遷以後，勿因變遷之故，竟受損失而已。我們在中國海岸方面，香港以北千哩之遙，需要一個港口以及一個艦隊站口，如得日本同意，我們便可佔有云云。』（原書旁註：俄皇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一日，曾向德國國務總理 *Fotienlo* 侯爵談及該報此項言論，並云：所謂一個港口者，乃指我們這裏而 *Melanie* *et* *chez* *nous*。）

究竟英國社會此種意見變遷之主動安在？是否果如俄國人士所揣測，『實受有政府方面影響？』抑或恰恰相反，社會方面實欲政府受其影響？現在吾人均無從加以判定。所可斷言者，即政府因認此種思想亦復益爲活躍而已，恐懼俄國，恐懼日本，恐懼

俄國地位之加強，恐懼黃種聯絡之增進，乃是（南北）兩極。當時（英國）Lord Ros-  
sby 政治，常動搖其間，不知所從者也。此種內心不定之情形，吾人可於當時該國所  
採毫不澈底之手段，以及屈意聽從他人主張等事，見之。就英國地位而論，本可本該居  
於領袖位置，解決此項東亞問題。然而該國却不如此；永遠遲疑弗定，以便最後只好將  
眼閉住，一點不幹。因此，吾人對於（是年）三月俄國懷疑英國態度之心，與日俱增一  
事，殊不引爲奇怪。而且俄國此種懷疑之心，更因倫敦政府是月月底對於停戰問題所  
持惡劣態度之故，愈爲增長。蓋當時聖彼得堡方面，曾竭力設法與英合作。俄國此種動  
機，誠然是大抵由於本國方面一切未嘗就緒之故；但就當時俄皇及（俄相）Lobanow  
等爵之意見與希望而論，倘若英國果願居於有力之領袖地位，則俄國必將追隨其後；  
在東方方面，決不去作逆英意旨之進取；雖受國內亞洲局署之逼迫，亦不爲之；此固毫  
無疑義者也。然而實際行動之期愈近，則倫敦政府之態度愈爲含糊，共同行動之希望  
愈爲減少。（俄國）侯爵（M. de Serebriakov）當一八九一年之時，嘗伴俄皇東亞之行，現在乃  
在報上嚴詞批評時局情形，並於三月底間建議，略謂：『我們只須倡言將向 Ilarat，

Meimane, Bulck 各地（在阿富汗斯坦北部）進取，則其勢必能迫着英人來與我們合作，早日促成中日和議，云云。』至於敦倫態度之混沌不明，即素來善於觀察之（德使）Hatzfeld伯爵，於四月四日猶不能察出究竟；吾人可於該使是日電致柏林之下列報告中見之。按其時係在日本和議條件業已公布之後，但俄國干涉條陳尙未交到之際。

『英相（For Kimberley）個人，亦以爲割讓旅順之結果，中國地位勢將等於日本保護，中國生存勢將大受危險，列強割地勢將層出不窮。但彼却至今不信，俄人對於中國互解一事，認爲有妨俄國利益，彼亦不信，俄人對於時局前途，有何干涉之意。彼又謂：法國方面對於中國之衰弱，並非不歡迎者。

據余所得印象而論，則英法俄三國之間，直到現在，似無何等協定；既無關於要求（中國）割地之約束，亦無關於列強共同行動之約束。

如果聖彼得堡方面欲向日本奉勸，將其強硬態度改爲緩和一點，並向日本表示割讓旅順一事，絕對不能同意。則據余所見，倫敦方面當可附和俄國主張，不持異議，反



之，假如聖彼得堡方面對於此事採取冷淡態度，則英國政府獨自出頭干涉之舉，却極不可靠。果爾，則今後所餘者，只是列強對於彼此爭割土地一事，互相妥協諒解，一個問題而已。

次日，柏林政府關於『日本新直布羅陀』之意見，既已達到倫敦；俄國政府叩問英國方面對於和議條件所抱態度之諮詢，亦已達到該處；於是駐英德使又復報告柏林如下：『（英相）Lord Kimberley曾立刻致電聖彼得堡英使，令其從新與俄交換意見。換言之，此事之決定，現刻全在俄國方面。倘若英俄意見趨於一致，則該兩國所希望之土地保證問題，勢將不久成爲討論中心。我們必須乘此機會，以實現我們希望。並向英國聲言：倘若英國對於我們參與列強討論一事，認爲必要，則英國必須贊助我們，得償其願，云云。』其實所謂『土地保證』問題，在倫敦政界方面，固早已思之甚熟，確比任何一國思之尤熟。關於此事，天真爛漫的Lord Kimberley某次偶與（駐英）德使談話之時，曾洩露許多極有趣味之資料；該使當於四月六日將其內容報告柏林，略謂：『從Lord Kimberley之談話觀之，彼極不願作有損中日兩國任何一方之行動。割讓遼

陳一事，誠然有危俄國利益與高麗獨立以及北京安全。但日本方面儘可將其要求縮小，只限於（遼東）半島南端小小部分。如此一來，危險雖未大減，但中國政府如能將其京城移往舊日首都之南京，却可使危險程度爲之減輕。云云。彼又謂英國利益大都集中於上海方面及其隣近一帶。倘若列強要求中國讓與土地，彼言至此，乃視地圖上而某處，並謂此處「不甚重要」的地方，實爲此間所需用云云。（原註：其意係指舟山羣島，爲英國五十年前，曾經一度佔有者。）現在倫敦政府方面，關於英國應採何種態度一事，行將加以決定。『吾人若就英相此種「不錯」與「但是」之論調觀之，實可以一方面看出倫敦政府之沒有確切辦法；他方面又可以看出英國其他政派之野心計畫。倘若當時 Lord Kimberley 果知此種論調之影響爲何如者，則彼必不至於貿然言之矣。換言之，即是中國首都移往南方長江旁邊，而長江入口之處，又爲英國勢力所在的上海以及英國艦隊所駐的舟山所控制。至於中國北方則直接委之日本。此即一般在野政客之目的。此輩政客實較 Lord Kimberley 會做生意一點。蓋由此又有一種防衛堡壘以抗俄國，並將中國中央政府同時置諸英國兵艦砲口之下；換言之，即是置

諸英國保護及勢力之下，衰落之中國，便可從此開始印度化。此種鼓吹論調，正與從前（英人）在北京方面，主張繼續戰爭下去，直至日人疲勞爲止，以及放棄北方邊鄙內地之意相同。據此看來，英國方面，確有一部分在野政客，比較政府中人爲進取。至於（英相）Lord Kimberley 僅以一種『不甚重要的地方爲此間所需用者』，作爲英國唯一要求之知足態度，只能使一般與彼一樣不悉東亞情形之人，得着一種良好印象。但英國此種偉大之計畫，持與俄國僅欲在高麗海岸得一不凍港口之希望相較，其相差程度爲何如者！

英國方面之見解既是如此，因而列強共同行動之希望，確極罕少。據四月五日聖彼得堡消息（俄相）Tobanow 侯爵對於當時局面，認爲十分嚴重。（駐俄英使）

St. Frank Tinselles 對於本國政府態度，本來不甚滿意，現在却不能將其憂慮，強爲遮飾。究竟列強彼此諒解一事，是否尙有成立可能？同樣，（法國外長）Hanotaux 先生對於列強妥協一層，亦復認爲希望甚少。蓋彼以爲俄國方面既保守一種神秘的緘默，而英國論調又極有利日本，故也。其在柏林方面，對於此事前途變化，亦復不甚樂觀。（

（德國外部參贊）Holstein 將此事之答，完全歸諸英國動搖不定之態度，可謂不錯。但該參贊却不斷的設法，以使倫敦聖彼得堡之間接近。彼於四月五日答覆（駐英德使）Hastfeld 伯爵四月三日報告之際，曾引用倫敦方面當時深憂俄國懷疑英國日甚之資料，而且怒不可遏的責備英國。並謂該國顯係深恐干涉之結果，竟與日本成仇云云。彼又言：吾人對於中日同盟一事，必須加以顧慮防備，蓋歐洲方面如果棄置中國不管，則中日同盟一事，確為中國最後自救之法，故也。彼所疑者，只是英國之所以持此穩慎態度，係由於恐懼日本呢？抑係英國相信，如果全力幫助日本，實與英人有益呢？至於德國對於此項問題，則有兩種目的：第一，亟欲預防黃色人種，在日本領袖之下，互相聯絡起來。其次，則欲使英俄兩國之衝突，減至最小限度，云云。同時該參贊又在聖彼得堡方面，令人通知俄國政府略謂：英國在未與他國妥協穩當之前，對於東亞事件，當不加以干涉，云云。在實際上，柏林方面確是希望保持列強歷來共同行動，未抱任何特別目的。即就希圖獲得煤站港口一事而論，柏林各方意見亦不一致。吾人試閱四月六日寄與倫敦德使之訓令，猶諄諄然以保持（東亞）大陸現狀為宗旨。其中有云：『對於德

國最爲有利者，即是如果能將日本（議和）條件向下壓抑幾分，以至於其他各國將來不能用爲口實，各向中國要求割地，云云。』雖然，此種努力，結果皆歸無效。（駐英德使）Hatsfeld 四月六日所預告之英國政府行將討論所採態度一事，其後果於四月八日實行議決。據該使是日來電報告如下：『首相（Lord Rosebery）頃向余言：今日閣議決定，此次日本議和條件，對於英國東亞利益，並無十分危害之處。如果實行干涉，殊乏理由根據。而且實行此項干涉，其勢非用壓力不可。至於（俄相）Tobanow 侯爵真欲對於日本穩據大陸，尤其是穩據旅順一事，加以抗議一層，該首相並不相信，云云。』於是俄國條陳遂遭英人拒絕。而且彼輩深信，列強共同抗議之說，勢將從此根本取消。（原註：該德使在其電報之中，特將『首相並不相信』句中之『不』字，加一橫線於下，特別令人注意，並非無故爲之。）蓋俄國方面固自有其重要理由，至今表示不願積極行動，而法德兩國態度，則又無鼓勵俄國積極行動之意。至於法德兩國獨自出頭干涉一層，則更爲萬無之事。因此，日本大可在其新得基礎之上，將其大陸勢力發展，並可由此造成一種抵抗俄國南進之新堤。至於黃種聯絡之危險，則很可大膽一肩擔起；凡



熟悉（東亞）情形之人，當深知此項擔負爲何如者。倘若列強羣起要求中國割地，則英國當然不願空手而去。即或英國此種思想果然不錯，然而吾人猶有十分懷疑者。即英國此種內閣議決，是否真係最後決定。蓋此項議決本來已爲該國之積極政治家所不贊成。如果該國政府預知俄國行將不顧英國，獨與德法兩國出來干涉，或者將其議決變更亦未可知，故也。其後數月之間，關於此點，曾有無數痕迹，表現於外。

英國拒絕俄國條陳以後，最初顯然曾使各國發生一種失望停頓之象。只有柏林方面，從前雖曾久抱穩慎態度，現在却堅守自己決議，毫不遲疑。而且即在此最稱多事的四月八日，換言之，即是俄國遞到條陳以及倫敦議定拒絕之日，直將德國贊成俄國條陳之意，電達聖彼得堡，並同時在倫敦方面公布。於是德國政府明白宣言：願與俄國方面，共作俄國政府條陳之步驟。並令東京德使，應與俄使同時齊在彼處發出宣言，云云。德皇根據 Thaut 氏說帖理由，遂對此項行動，表示同意；而且對於此項行動之影響，甚爲了悉；不過對於此舉『全部影響』，則嫌未嘗確切洞察耳。蓋當時柏林方面，誠然知道，或者將與一個戰無不勝之敵人，在遠隔重洋之地方，開始軍事衝突，而且派遣陸

海兵士前往，必需海程兩月；作戰之時，又無一定天然根據。但是却不知道，德國已在前途難測之世界政治舞臺中，作了第一步驟；就當時德國關於此種方面之幼稚經驗而論，其勢亦不能知道。至於柏林當局之所以如此決定者，實有數種原因：第一，恐怕日本之努力奮鬥與中國之巨大財源，合在一手之中；其結果歐洲利益勢將不免受其危害，而前途甚有希望之德國利益，當然亦在被迫之列。第二，德國決計如遇列強再行瓜分海外殖民土地之時，不再站在旁邊，空手而去。第三，德國政府心中，或者欲藉此項機會，與俄接近，並使俄法親密關係，爲之鬆懈。惟德國當局平素既竭力設法與英親善諒解，因而上述第三原因，當然只佔次要地位。當四月九日 Brandt 覲見德皇之時，德皇曾語之曰：我們與俄合作，則我們東陲情勢，便可緩和一點，假如同時能够促使俄國勢力多向東洋方面發展，並在該處牢牢拴住，云云。柏林方面之爲此步驟，並非出於輕心，吾人可於德國屢次向日表示希望之中見之。蓋德國嘗希望日本方面，自將議和要求條件減輕，以使列強出來干涉結果很難預測之舉，根本失其必要，故也。只因此種希望之故，乃有三月六日向日警告之事。倘若英國方面不用曖昧動搖態度，直將此種壓迫之效

根本取消，或者該項警告，竟收效果，亦未可知。因爲英國態度之故，於是遂使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兩人，抵抗日本國內軍閥一派之力量，亦復大爲挫弱。

其後數日之間，因受英國拒絕影響之故，列強並無何等行動，惟緊張程度顯然逐漸增長而已。其時德國方面已將彼之決議，向衆宣布。反之，俄國方面却開始猶豫起來，而法國方面則又灰心失望。當時德俄法三國無不竭力設法運動英國，改變態度。在四月七日之時，換言之，卽是英國閣議決定態度之前一日，（駐英德使）Hatfield伯爵爲挽回局勢起見，猶復提出條陳：假如列強妥協不能成立，則應向倫敦巴黎聖彼得堡三處建言，開一會議以討論之。各國並宜各自負責，不在東亞方面圖謀己國特別利益，云云。（德國外部參贊）Holstein 先生於四月十日，曾令（英國首相）Lord Rosebery 注意英國孤立之危，並謂此種孤立危險，將因該相『軟弱態度』之故，愈爲增長不已，云云。其在巴黎方面，更是慌亂失措已極。（法國外長）Hanotaux 先生初時竟信：日本方面業已獲得俄國同意。此外，該外長對於英國參與一事，如何重視，吾人可於彼對德使之談話中見之。蓋彼曾謂：『關於三國共同行動而無英國參與一事，彼現在

尙須加以熟思，暫時保留決定之權，云云。『誠然，此種決定並未久爲延擱，蓋在四月十二日法國閣議之時，卽已決定接受俄國條陳。而且 Thiotaux 並已宣言：卽或英國不與其事，彼亦願與俄德兩國，對於此事繼續協商諒解，云云。但是同時却令倫敦法使，再請英國政府注意，該國脫離歐洲聯合戰線所發生之責任。其在俄國方，在勢本來應下決定者，現在反閉口不言，一如從前。緘默情形。其原因，大部分係由於聖彼得堡方面之個人關係。蓋（俄相）Fiora已於久病之後，在是年正月病故。繼其任者爲Tolstoy侯爵，乃係一位七十年紀之人，亦復甚爲多病。（原註：彼在次年死去。）而且對於東亞問題毫無經驗。當時亞洲局長Tupinist伯爵乃是唯一了悉此項問題之人，但彼却故意不告其時外部實際主持部務之長官Schischkin，使其茫無所知；而該伯爵自己又不能直向俄皇奏陳。因此，當時俄國政治遂陷於一種停滯危險之中。此外，聖彼得堡普通方面，對於此項問題未能毅然決定者，似乎受有英國脫離事件之影響。四月十日駐俄德使曾來報告，略謂：『現在仍然未下最後決定，云云。』四月十五日又來報告，略謂：『（俄相）Tubonow現在尙望英國加入，因爲（英相）Lord Rosebery態度現又

動搖不定，故也。云云。』據四月十六日倫敦傳來消息，亦謂現刻英國方面完全不知俄國真意之所在。此間當局正與法國大使討論列強會議事件，云云。

## (二) 馬關抗議與其直接影響

其間日人對於歐洲各國此種意見紛歧之情形，曾設法加以利用。四月一日日本所提之和約草案，誠然未被華人正式拒絕，但是却被華人竭力爭駁。中國方面因望歐洲列強出來干涉之故，特向各國政府通告，略謂中國對於日本和議條件，業已拒絕，云云。其後因爲中國爭論的結果，伊藤博文乃於四月十日——陸奧宗光伯爵因病未能再與會議——又向創疾已癒之李鴻章，提出新草案。其中關於割讓大陸土地一層，願減至只割盛京南部一小部分。關於戰事賠款一層，願減至二萬萬兩。其餘各種條件，則大體未有變更。日人方面宣言：此項新草案，乃係要求最低限度；對於其中細目，當然可以磋商，但是絕對不能再行減輕，並限定四日之內答覆，或接或拒。蓋日人深知和議延宕之危，並相信從速弄成已定事實，以使歐洲列強現尙猶豫之干涉舉動，完全擱置。於是最後一次會議，乃於四月十五日照定時刻開會。開會之時，李鴻章遂以不卑不貶之



態度，表示讓步。此項和約乃於四月十七日在馬關簽字。其內容大體，悉照日本最後一次草案。關於交換批准公文一事，係定於五月八日在煙臺舉行。

於是中日戰事，從此遂告終結。倘若列強現在欲阻此種已成之結果，則恰當時機，實未免已經錯過。其在倫敦政府方面，則於四月八日內閣會議之後，爲時未久，而態度又復從新動搖不定。四月十日（駐英德使）Hatfield伯爵曾來報告，略云：『（英相）Kimberley伯爵，曾將彼與余之最後一次談話內容，轉告（駐英）法使，並言余所提出之各種理由，曾使彼之向來意見，略爲動搖，云云。此外Concord男爵與余，皆以爲：假如俄國當初若不坐待英國此種軟弱，小心內閣關於中國請求調停和議之決定，而是先與其他各國協商一種共同行動基礎，然後再請英國政府於二者之間，自擇其一，或者參加共同行動，或者自願完全孤立，則此事之在倫敦方面，當較現在情形爲佳，亦未可知。蓋如此則英國政府易向國內輿論方面，爲其政策辯護云云。』當中國（駐英）代辦於四月十日既已回英通知中國業將和平條件拒絕云云，於是（英相）Kimberley以爲繼續戰爭一事，實屬可能，並謂果爾則將另成一種新局面，可使英國將其見

解與決定，爲之變更云云。因此，彼德望與其他各國繼續爲友誼上的交換意見，德國當然亦在其內。據此，則四月十五日（俄）Johnow 猶望英國加入合作一層，實非完全無因。而俄國態度之所以延遲不決者，亦可由此得知其故。到了四月十七日，換言之，即是馬關和約簽字之日，俄國方面終竟毅然決定。（德國）駐俄代辦致電柏林，略謂：To snow 侯爵向余通知如下：英國脫離合作之舉，遂使俄國不能不將責任擔起，獨力保護俄人東亞利益，以及歐洲方面之東亞利益。俄國政府現已決定，最初先用友誼的態度，請求日本對於永久佔據大陸方面中國領土一事，加以放棄。Johnow 侯爵預料德法兩國，一定參加此種行動，並已於昨日訓令柏林巴黎兩處俄使，倘若日本不願遵從此種友誼勸告，則俄國預計，即由俄德法三國戰艦共向日本開戰云云。』同時並按照此種決議內容，訓令北京俄使，勸告中國政府，對於簽字和約之事，不要太忙云云。於是德國政府即於同日電致東京德使 Guschmid 下列訓令一道：

『（一）俄國（駐德）代辦曾向我們通知：

「考察日本和議條件之結果，遂使俄國政府深覺日本要求佔有遼東一事，實令

中國首都，永久受其壓迫。同時並令高麗獨立，成爲一種幻想。因此，此項佔領，實爲東亞和平之永久障礙。（是以特令）東京俄使將上述各語，向日通知，並同時勸其放棄永久佔領遼東之舉。」

假如東京俄法兩使方面，一日奉命發送此類宣言，卽請閣下亦復立刻向着日本政府，爲同樣之表示。

（二）附錄，以作閣下措詞資料。

去年十月七日，英國方面卽已提議：列強對於中日糾紛，應該加以干涉。當時德國因爲對日友誼之故，曾拒絕參與。

惟現在日本所提和議條件，却未免過甚，實屬有傷歐洲利益；對於德國利益亦然，縱然德國所受損失比較微小。

因此，我們現在不能不共同抗議。如遇必要之時，我們對於此種抗議，並將給以有力後盾。

日本必須讓步，若與三大強國相戰，前途實無僥倖希望。假如日本政府對於讓步

一事，只以召集會議討論一種辦法，爲唯一無二的不是被人屈服的方式，即請閣下將此立刻電告本處。』

（東京）俄使同時亦接（本國政府）同樣訓令，而（駐日）法使——則是很可能令人注意的，——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始接（本國政府）訓令。

此種（對日行動之）步驟，頓使英國方面大受刺激。其後數日之間，確曾令人得着一種印象，似乎英國方面仍將參與列強共同行動之舉。至少駐英各國大使皆曾得有此種印象。（駐英德使）Hatzfeld伯爵在四月十八日，甚至於在四月二十日，猶向柏林報告云：『英國加入列強（行動）之可能性，至今仍未消失。英國政府現又開始詳細思考。法國（駐英）大使之意，以爲倫敦內閣意見，現正改爲趨向加入一途云云。』又據聖彼得堡方面傳來之消息，亦謂（英相）Lord Kimberley對於英國此種完全孤立之局勢，甚爲不懌，似正趨向改變方針一途云云。（駐俄英使）Sir Frank Lascelles對於茲事之如此經過，常表示惋惜之意，不稍隱瞞。而且明白向人言曰：彼甚不懂英國此種態度云云。但倫敦方面主張英國今後行動，必須顧及日本，而且日本最足

以代替瓦解的中國，擔負抗俄的責任之一派，乃佔優勢。究竟英國此種改親日本之行動，有何目的，吾人可於四月二十三日 Daily Chronicle 所載之論文中見之。該項論文顯係出於重要政治人物之手筆，其中曾爽快明白言曰：『假如日本果能承認英國確有應在北方得一艦隊支點之必要，則英國便可成爲日本之友，云云。』此種思想，並非新物，蓋我們已於三月中旬，嘗在英國報上見之矣。大約此種思想，係發之於海軍界中。因彼輩嘗要求得一港口，以作不適於用的 Port Hamilton 一港之補償，故也。至於四月二十九日，Standard 報上以及其他各種報上之論列，則吾人只能認爲上述真正動機之表面裝飾而已。蓋該報等曾言：『英國雖是歐洲一個國家，但同時亦可算作亞洲一個國家。因此事實之故，我們如遇亞洲方面發生任何一種糾紛危險，或者我們應當獨自加以處置，或者我們對於一種共同行動，必須擔負指揮及監督之責，云云。』英國脫離（列強彼此共同行動）之舉，從此遂完全確定。

四月十八日（駐德日使）Admiral 奉命向柏林外部通知，（中日）和議告成一事，並表示希望德國繼續其友誼態度之意。（德國）國務卿 Muschel 乃答彼曰：德國去

年拒絕參加（英國方面所條陳的）干涉行動之友誼態度，可惜未得對方同樣之友誼報答。日本並將今年三月德國所進之良善忠告，當（着耳邊之）風吹過一樣，云云。

『（日使）Adami 承認此種責難之言，並非無因。而且自言：曾經屢請本國政府採擇德國忠告，云云。吾人若就德日兩國至今良好關係，（此就日使之談話中，可以見之）以及德國利益確受此次東亞事變之直接影響最少，兩事而論，當然德國對於此次向日抗議之舉，宜取一種形式，足使中日兩國人士，皆認為德國此次之參加，實與彼等有益。換言之，即是只要環境許可，德國宜自居於調人地位，是也。此種調人地位，幸於前次三月六日（德國向日）秘密警告之時，業已早爲之備。蓋當時日本方面則感謝德國之通知，中國方面則感謝德國之玉成，故也。當時日本方面對於德國此種暗示，雖未嘗加以注意，而德國地位却不曾因此而弱。不過（德國外部）Holstein 先生對於此種必要情形，當然不能洞察；蓋彼於東亞問題，向無所知，且極冷淡，故也。當時彼欲立向日人提出限期答覆之要求，以表示（三國）干涉之舉，並非兒戲。但是聰明的（駐英德使）Hatzfeld 伯爵，曾經向彼特別警告，略謂：德國態度切勿比較俄法尤爲強硬。否則

所有日本仇怨，皆將落在德國身上。蓋俄法兩國希望英國加入之心，既未嘗完全斷絕；而法國參預此舉，又只是由於對俄友誼關係一點，云云。至於德國方面可以自行表示其爲溫利份子之機會，亦確不少。其後日本政府以三國此舉，將使日本國內發生各種困難情形之故，乃向聖彼得堡方面，請將三國所提要求，自行撤回。而（俄相）Iobanow侯爵對於日本此請，當然加以拒絕。但四月二十九日，（駐俄）日使向（駐俄）德使Radolin侯爵所提出之條陳，主張退還遼東而以加增賠款數目爲條件；其在賠款未付以前，則由日軍暫行佔領該地云云；在柏林方面却頗有惠然容納之意。到了五月一日，（駐德日使）Aoki復奉命提出同樣條陳，並加以下列擴充：即旅順港口應歸日本永遠佔有，是也。柏林方面對於日本希望永遠佔有旅順一事，誠然加以拒絕，但對於日本其餘希望，則允代爲說項。此外日本政府希望爲保持日本名譽體面計，所有前此預定之換約一事，仍須照舊舉行云云，亦得柏林方面之諒解。於是五月四日（柏林外部當局）Marshall男爵，乃向駐德日使通知：中國當於換約之後，特向日本提出請求，自願加增賠款數目，贖回遼東，云云。其後數日之間，中國政府對於此事亦復表示同意。惟

此項問題當時曾遇極大難關，若非德國政府特別堅持，其勢頗難解決。蓋俄國從前曾向中國勸告，對於批准條約一事，切勿過急，云云。因而北京政府依照此種勸告，對於前此約中預定五月八日（煙臺）換約一層，殊不願如期實行。此外北京政府更懼正式換約之後，則要求退還遼東一事，勢將成爲畫餅，不勝遲疑之至。於是德國方面，乃於五月五日，特向北京通知：換約一事，決不許有所遷延。次日，柏林外部對於中國駐德代辦之抗議，亦復不爲之動，照舊堅持。而就日本當時對於此事所持之態度而論，亦使三國政府其勢不能辭責。蓋東京政府曾於五月五日特向柏林聖彼得堡巴黎三處通知，略謂：日本因顧及三國友誼勸告之故，對於永遠佔有遼東一事，自願加以放棄，云云。於是抗議目的可算達到。所有其時三國艦隊司令，在中國海面所準備之軍事行動，當然亦歸無用。但在俄國方面——此爲聖彼得堡方面新起一種風勢之表現——却相信關於換約問題一事，尚須採用特別壓力。俄國戰艦十七隻，齊集煙臺港口，特向日人表示一種軍事示威運動。其意若曰：假如日本因爲中國拒絕換約之故，從新採取攻擊行動，則俄國方面決不能再行忍耐，云云。此外，德國駐紮東亞之巡洋艦兩隻，其時亦泊煙臺。



港內。反之，法國艦隊則駐在Nagasaki方面；至於煙臺方面，法國却只留巡洋艦一隻駐泊。蓋法人方面似乎不願於抗議目的既達之後，再行追隨彼之盟友，更作其他舉動。而當時俄國對華所下之（緩批條約）勸告，既未嘗撤回，於是北京方面陷於一種困難情形。其時俄法兩使均未接有本國政府任何訓令，以向中國政府建議，關於換約問題應採之態度。而德使方面，却堅持換約一事，非照期實行不可。當時中國全權大使業已隨帶正式約本，前往煙臺；惟北京政府却遲遲不下實行換約之令。到了五月八日午後，（北京）德國使館之內更大演一場戲劇：中國大臣以極熱烈之情感，將所有東方向來中庸習性，盡行忘去，力請德使共與俄法兩使一致行動，並求其允許換約一事，展至遼東退還問題業已解決之後，再爲舉行，云云。其後，北京政府確信德使態度堅決，無可挽回，乃將訓令拍往煙臺，實行換約。——由此可見德國地位之何等重要。——是日彼此交涉爭持，幾將全日時間佔去，直至夜間十一點半鐘，然後始行換約。因此日人『而子』乃得顧全，而華人關於改約一事，亦復得有相當擔保。於是中日雙方，皆應感謝德國之助。此項東亞問題，經三國之出來干涉，得以迅速解決，實係出乎意料之外，並使其

後數月之間，局面爲之特別變換。——按最後一刻之間，西班牙曾力請加入，成爲四國；但此事在實際上並無重要意義。——因爲此次日本反抗力甚爲微弱，出人意料以外之故，於是俄法兩國一反其向來之猶豫消極，而變爲強硬態度。並且其時俄法兩國對於德國之參與其間，殊感不便；顯然亟欲將此第三者擺脫，仍爲兩人團體。該兩國此種舉動，實使一般對於此次東亞共同行動專從歐洲政治（大局）着眼者，大爲失望。當時俄國一部分政界及其報紙，曾發生一種思想，其意以爲德國方面只欲利用俄國之助，以便關於非洲問題以及其他殖民地問題，得有一種憑藉，以對付英國；而俄國方面對於東亞問題，却完全不必需用他人之助，可以處置裕如，云云。——此種識見發生之晚與驟，均可令人注意。至於法國方面，本來對於此次東亞共同行動，直到而今均只算是勉強合作，殊非心甘情願者，而現刻却似乎飲食之際，胃口忽然大開。當其中日相約既已批准之後，於是中國方面乃提出建議：——當然係由法國之助，——法國應該出來干涉日本佔有臺澎之舉，云云。但俄國方面對於此種干涉，却不願加以贊助。不過在（俄相）Tobanow 侯爵個人方面，對於法國是否能夠取得臺澎諸島幾許一事，雖然

不甚注意，但彼却不願法國背彼而去，於是竭力避免將來法人野心不遂因而歸咎俄國之處。蓋法人此種野心，因時局已無危險，不免大爲增長，故也。因此該俄相甚希望法國此種企圖，能因德國之反對而擱淺。在實際上，德國對於再向日本續提抗議之舉，確曾加以拒絕。蓋此類抗議，實超出原來範圍之外，因原來範圍，只限於大陸問題，故也。至於 Iobanow 侯爵個人對於法國此種野心之真實意見如何，吾人可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一日，彼在德國使館飯後，向着其時方正勾留聖彼得堡之德國國務總理 Holme 侯爵所發表的言論中見之。彼云：『我們之盡力（勸告）法國，實是對於歐洲作了一大功績。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我們不將他們（譯者按係指法人而言）輾轉拉住，他們將做些什麼勾當出來。』此外，俄國報紙嘗明白要求政府，利用機會，佔領一個高麗港口。或者力爲西比利亞鐵路終點，謀得一塊土地云云。而德國方面對於俄報此種要求，因有種種原因之故，完全採取中立態度。既不加以鼓勵，亦不加以反對。無論如何，當時日本伊藤內閣地位，既已如彼困難，而日本國內羣衆，因爲三國干涉所引起之憤慨情形，又復如此激烈，政府竭力設法安慰，始稍稍歸於平靜，現在却不應再提何種

抗議，以使日本國內難關，再行增劇。因此之故，德國方面乃屢勸俄國稍爲緩和一點。其結果，德俄兩國之間不免發生意見紛歧之事。當是年九月十一日，德國國務總理 Herlohe 在 Peterhof 謁見俄皇之時，俄皇曾以此爲言。並謂（德國外部當局）Marschall 先生對此實應負責。此種意見紛歧之處，據俄皇自言，當時已經解釋明白，所有東京方面之討論，只是了結其餘未了之事云云。在此情形之下，於是與日接洽退還遼東一事，進行殊不如此順利，一如一般人之所想像。中國方面最初拒絕加增賠款一層，李鴻章 並屢向日本提議，此項問題宜由中日兩國直接談判，以避免三國參與爲善云云。相傳李氏 因憂俄國壓迫日甚之故，甚至於向日提出，自願允許日本建築一條京津鐵路，並結一種中日同盟，以爲補償云云。日本方面對於李氏 此種提議，加以拒絕。同時，又因德國亦不贊成無償的退還遼東之故，於是俄德法三國乃於十月十九日，在東京方面，與日結成一種協定。依照該協定，日本可以多得賠款三千萬兩，而遼東日軍則應於中國繳付此項賠款之後，三月以內盡行撤去。此外，日本政府並承認臺灣航線 爲國際交通要道，日本決不壟斷獨占。最後，日本政府更負責宣言：澎湖諸島 永不割與其他各

國云云。於是中日兩國乃於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方面，實行正式訂結關於上述諸點之協約。

### (三) 三國抗議事件對於德國政治前途之關係並評論其得失

此次重大事件，遂如此告一段落，成爲世界大勢前途發展中，主要根苗之一。而德國當局（在俾士馬克退職以後），對於自己今次決定，究竟前途影響如何，本未完全洞悉者。現在亦復牽入漩渦而去。至於德國政府之意，一方面欲使德國在華前途，根基穩固，而他方面則又希望對日友誼之犧牲，萬物超過必要程度。惟德國當局此種心意，在此次干涉行動之中，實未充分表示出來。迥與從前所持態度相異。其實將此心意充分表示出來之舉，就當時情形而論，確爲可能，確爲必要。德國之調停溫和態度，其在干涉以前，與夫干涉以後，卽在日本方面，亦未嘗不加以承認。其所以未能將此優良境遇，盡量保持利用，一如吾人所希望者，實由於舉行此種干涉所採之方法，太不善耳。本來

（德國）國務員Muechell以及（德國駐英）大使Hatsfeld伯爵，對於此次干涉行

動，皆嘗有深思熟考之主張，但此種主張，不幸竟爲當時主持其事之（外部）秘密參贊 Holstein 與夫（德國）駐日公使 Gutschmid 兩人，將其功效之大部分，犧牲喪失。蓋該項（寄往東京）措辭強硬之訓令，即係出自 Holstein 手筆，用作駐日德使談話資料者也。（譯者按，Holstein 雖只係參贊，但在外部中極有勢力。）凡（德國駐英大使）Thorn 所警戒勿爲者，此處無不恰恰相反爲之。其結果，此種毫無目的之武力恐嚇舉動，本爲俄國條陳之中所無者，竟使德國挺立前而，彷彿自己在諸國中實爲受損最大之國一樣。其實此種浪費氣力之舉，儘可委諸俄法兩國爲之，一如（駐英德使）Hatzfeld 所希望者。至於（德使）Gutschmid 之爲人，則係屬於下列一種外交家，爲吾人所習見者，即其人只知道顯露自己頭角，促進自己官階爲服職之目的；而對於此種外交要務自身，則却絲毫不懂，亦無一點興味，是也。該使若能謹守上而所述主要思想，先與俄法兩使相商，然後自行草擬一種措詞方式，則其勢必較柏林方面所草擬者爲佳，然而該使却不如此。同時更因該使個人態度之故，反將 Holstein 恐嚇舉動的程度，大爲增加。該使對於德國在三國中之地位關係，絲毫不管，竟自挺身立於俄法兩

使之前，自認爲此次全部舉動之主要人物。蓋當時（俄使）Hitrovo（法使）Tarn-  
and 兩人對於 Gutschmid 之自負態度，顯然察出，頗知所以利用，故也。Gutschmid 自  
已嘗於四月十九日報告柏林云：俄法兩使曾推彼往見日本外務次長（Hayaschi），要  
求陸奧宗光子爵立回東京。（時陸奧正在Kyoto 皇宮），以便接受某種重要外交公  
文，云云。當時俄法兩方曾要求該使於提出三國抗議通牒之際，宜以領袖資格，首先發  
言，云云；該使對此要求，雖然拒絕，而願以首席讓俄，次席讓法；但彼在提出抗議之際，却  
自知立於萬目齊集之地，大出風頭。當俄法兩使將其責任，出以友誼形式，迅速輕便辦  
理了結之際，而（德使）Gutschmid 則不恤應用鄭重堂皇的手續以爲之。時陸奧宗  
光因病未能到場，該項抗議遂於四月二十三日午後，直由（日本外務次長）Ha-  
aschi 接受。（德使）Gutschmid 曾於四月二十四日，將此報告柏林如下：

『（俄使）Hitrovo 先生於遞交勸告之後，並附以解釋。略謂：彼甚希望，日本政  
府如果對於永久佔有遼東半島一事加以放棄，當可使彼到日本以來所促進之俄日  
兩國友善關係，更將向後繼續保持不已。而且直向三大強國『抵抗』résistance——

俄使並未如余直用『開戰』Inte一語——一事前途實係毫無希望。彼自數月以來，即常屢向日本政府警告，切勿合併大陸方面之土地。蓋此種合併之結果，其勢只使日本趨於衰弱而已。最後該使又言：希望日本對於俄國此次宣言，視為俄國對日友誼之又一新確證據云云。

至於法國公使，則緊接俄國公使之後，將其宣言交遞。此外僅僅說了幾句普通忠告，與夫法國友誼之語。

余在遞交吾國宣言以後，曾依照訓令發言，並略爲補充曰：余在本年三月八日，因奉本國政府訓令，曾向日本勸告，速以輕寬條件，訂結和約，以避各國干涉之危。而且特別聲明：假如日本要求割讓大陸方面土地，則最易引起各國干涉——此種勸告可惜未爲日本所注意——云云。余之此項言詞，頗使日本外交次長Hayaschi得着一種深刻之印象。該次長（初時）似甚驚惶，直到余（待）使館譯官將宣言及附語譯成日文誦讀完竣以後，並從而爲之解釋。該次長始稍安貼。蓋余當時曾加以解釋曰：此項附語之用意，無非欲使日本政府，明瞭時局情形之十分嚴重，與夫拒絕我們勸告以後勢



將發生之（不祥）結果而已。余甚希望日本政府只將上述忠告，視作德意志帝國政府對日真確友誼之又一證據云云。倘若余之語言口氣，或者稍較俄法兩使爲強硬一點，則余之此舉，其意無非欲使日本特別注意時局嚴重情形，並令該國對於答覆三國一事，特別詳慎思維而已。」

該使於上列報告之內，並附錄宣言及附語原文如下：

『宣言及附語原文如下：

余之最高政府，曾寄訓令與余，命余發表下列宣言：「考察日本和議條件之結果，遂使德國政府深覺日本要求佔有遼東一事，實令中國首都永久受其壓迫；同時並令高麗獨立，成爲一種幻想。因此，此項佔領，實爲東亞和平之永久障礙，是以德國敬勸日本政府，對於永久佔有遼東半島一事，加以放棄。」

余並奉命，於上列宣言之後，附以下列附語。

「日本於此次戰事期間，固嘗屢次獲得德國對日友誼之證據。去年十月七日，英國曾提出列強出來干涉中日戰事之議；當時德國因對日友誼之故，當加以拒絕。此外，

(德意志) 帝國政府又於今年三月八日，勸告日本政府，從速訂結和議，減輕和約條件，云云。當時因念列強或因中國方面懇請，行將出來干涉和議，於是德國乃向日本進言，謂日本若以輕寬條件，直接與華議和，不待他國出來調停，實於日本方面，比較最爲有益。並曾特別明言，要求割讓大陸方面土地一事，最易引起列強干涉，云云。可惜日本於此種毫無私心之勸告，未嘗加以注意。

現在日本所提和議條件，却未免過甚，實屬有傷歐洲利益，對於德國利益亦然；縱然德國所受損失，比較微小。

是以(德意志) 帝國政府現在不能不共同抗議；如遇必要之時，對於此項抗議，並將給以有力後盾。

因此，日本大可以讓步，蓋向三大強國宣戰，前途毫無希望，故也。

該使於四月二十六日，又繼續補報，謂彼在交遞宣言之後，曾向(日本外務次長 Hayashi Goro) 假如日本政府對於讓步一事，只以召集會議討論一種辦法，爲唯一無二的不是被人屈服的方式；則彼(指德使而言) 曾奉訓令，立將此種日本希望，

電告柏林云云。』究竟該使是否真正曾將此種思想，（原註：此種思想，係發自〔駐英（德使）Hatzfeld伯爵已於上文言之〕）一向日本政府言之，吾人實不能無疑。無論如何，日本政府方面實始終未嘗利用此種思想。

吾人若於（德使）Gutschmid 此項報告之外，再將（日本外務次長）Hayaschi 所作報告，曾刊行於彼の筆記之中者，一爲比較參閱，實非（毫無興趣）不關重要之事。吾人對於該次長之記載，可以推斷不疑者，即其中頗有故意加倍描寫之處，頗受彼之後來排德思想所支配。但在他方面，吾人又可以相信不疑者，即此項記載，當能將（德使）Gutschmid 彼時所持態度，深印之於日人腦中者，照實寫出。此項印象，迥與該使報告（柏林）外部者不同，或者迥與該使自己所想像者不同。（日本外務次長）Hayaschi 記載之中，有云：『關於（三國）抗議時節，德國政府對日之態度，吾人可於下述一段有趣情形之中，得着一些概念。當三國抗議之時，外務總長陸奧宗光伯爵正在Kyoto 地方。所有部務，皆由余手代行。因此，關於三國公使接洽之事，亦由余手辦理。某次（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法兩使前來部中謁余，同時帶來一種用法

文寫就之簡短宣言書，對余念讀，並將其留存余處，以便余之密閱。

同日，但在午後時節，德國公使亦來訪余。該使對於英法兩國語言雖然深諳，但彼似乎覺得，用上述兩國語言草寫宣言，未免不稱。同時，又因余不懂德文之故，於是彼乃帶來一種用 Roman 寫就的宣言書。（原註：換言之，即是用拉丁字母拼成之日本文，所寫就的。）並命彼之秘書 Wierpert 先生向余念讀。該秘書對於日本通行之文字，雖然十分認識，但現在彼必須大討苦吃，拿着一篇素不通行之拉丁字母所拼寫的日文誦讀。蓋該項宣言原文，本係用漢字所草成者也。因此該秘書誦讀該項宣言之時，無論該使，以及該秘書本人，彼此皆未懂得其中一字。此固十分明白（不待智者而知）者也。至於余之個人，雖然特別專心注意諦聽，但對於宣言書中之意，仍是一點不能了解。

至於法俄兩使所留下之宣言書，其內容只是幾句簡單建議，略謂：日本政府宜將馬關條約所得土地，退還中國。其所以進此勸告之理由，則謂完全出於隣國友誼關係。反之德國公使則言：日本若與俄德法三國開戰，可謂毫無勝利希望。因此，對於日本方面，實以接受三國勸告爲最善之道。

余當時係站在棹旁，對着德國公使，並向其言曰：閣下貴同事俄法兩國公使曾來此處，並交余一種友誼勸告，其內容係以保持和平爲目的。該項勸告之措辭，十分友誼，反之，閣下宣言之用語，一若此項問題將以武力爲解決之道也者。倘若閣下之意果如此，則對於（日本）國家之尊嚴及國民之感情，必須加以注意；至於宣言中之措辭（侮慢），吾人此時姑且置而不論。大約此項宣言係用日本語言草成，而閣下對於此種語言，又非嫻習，因而選詞用字，不免錯誤，云云。

該使於是向余回答，措詞及態度均極拙劣（awkward）。略謂：『宣言內容意義，果如余之所言，則實非出於彼之本心。倘若宣言之中果有此項意義，則係由於日文誤譯所致。云云。』彼願將此宣言撤回，並請余關於德國宣言之內容，即以俄法兩使宣言內容爲準，云云。『隨後（日本外務次長）Hayashi更將俄法兩國宣言附錄於下。俄法宣言內容，全與當時俄國（向德法）所條陳者相同，毫無一點恐嚇之意。誠然，當俄法兩使面晤日本外務次長之時，或者口頭曾言：倘若『抵抗』三國勸告，實際毫無用處，云云，此固非必無之事。而（德國外部參贊）Holstein與（德國駐日公使）Gutschmid

兩人却直用『開戰』一語加以威嚇。至少 Gutschmid 於其報告內面附註之中，曾將『抵抗』(résistance)『開戰』(lutte)兩語，特別提出。無論如何，俄法兩使一如當時俄國條陳之意，係用一種友誼形式爲之，實較(德使) Gutschmid 措詞態度爲溫善。至於(日本外務次長) Hayashi 此種筆記，其中亦頗有不合情理之處；但此事有一前提，卽此項筆記之西文譯本，完全不錯，是也。蓋照該項筆記所言之情形，在事實上萬不能有，故也。德國使館譯官 Weierst博士，乃係一位對於日本語言文字，日本交際儀式，極有研究與經驗之人，當不至於發生此種無意識之思想，將一篇本係日本文字草成之宣言，而改用拉丁字母拼音以書之。又該筆記所謂，該譯官對於自己所讀所譯之宣言，並不能懂云云，亦係萬無之事。關於當時經過實在情形，可惜現在似已不能得其真相。因三位當事之人，(譯者按，係指日本外務次長，德國公使，及譯官三人而言。)均已死去，故也。不過吾人可以相信不疑者，卽此種甚爲重要極關得失之會晤中間，德國曾留下一種印象，實與彼之真正態度不符，是也。

此外，更有一種影響尤甚之現象，足以大損對日邦交者，則爲下列著名標語之產

生，即『歐羅巴各民族呀，保護爾等最爲神聖之遺產！』Völker Europas, 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 是也。此種標語更將此次抗議之事，增色不少。於是幻想中之『黃禍』爲西洋各國，尤其是爲英俄兩國，輿論界所流行者，遂使『歐洲諸國——一如（我們威廉）皇帝美術家所自言者，——各以本國神靈作其代表，爲天上遺來的頭等天使 Michael 所召集，共商如何聯結，抵抗佛教異端野蠻的侵略，以保護十字架之道。』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jede durch ihren Genius vertreten, zusammengerufen durch den von Himmel gesandten Erzengel Michael, wie sie sich im Widerstande gegen das Fingreifen des Buddhismus, des Heidentums und der Barbarei zur Verteidigung des Kreuzes vereinigen（原註：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德皇威廉第二致俄皇之函。）德國於此又復甘作一種理想之先鋒而不辭，其實此項理想之實際利害關係，德國却遠不如其他各國。而且此項理想之基礎，係建築於一種錯誤歷史觀念之上；對於他種富有自尊思想的文明古族之感情，勢必深爲傷損，此固大可不必者也。於是此種標語，遂與原來意旨相背，成爲西洋各國妄自尊大，不諳異種文明之永久紀念。

至於德國當時對待日本，極宜表示一種親善之態，此又明瞭易見，不待智者而知者也。此次抗議之實行手續，曾使日人對於德國真實態度，無從洞悉。而且不知德國參加此項已成事實之抗議，實與日本極有益處。（日本外務次長）Hayashi於其記載之中，曾言：『吾人可以揣知者，即俄法兩國之所以提出抗議，只爲吾國擴充領土一事而已。至於德國則不然，在和約尙未議結以前，早已存心干涉；而且甚望所結和約，恰與彼之心意相投云云。』該次長此項主張，實與從前彼之自己記載，大相矛盾，乃是一種毫無根據之談。其實該次長對於德國所發一切言論，吾人皆可以作如是觀也。但在他方面，吾人又可以想見，日本國內對於德國政策之誤解爲何如者。

雖然如此，而吾人對於『日本仇視德國最深』以及『馬關條約以後，日本對德永成仇敵』之言，仍然不能相信。蓋當抗議提出之際，日人感情飽受刺激，誠然已達極點。但吾人竟謂此種仇視情形，德國實首當其衝云云；則無論在一八九五年，以及其後數年期間，所有日本報紙與日本政界，皆無何等仇德言論，足以證明此說之不虛也。吾人所習見者，只是日人方面始終不能了解德國參加之動機與關係。其所以如此者，



當然德國政府與駐日德使，應首負其咎。蓋德國政府與駐日德使，未曾努力，或未曾充分努力，以使因辦理不善而掩蔽之事實真相，彰然於世，故也。至於日本政府方面，消息本較靈通，如果具有誠意，亦未嘗不可設法使此真相爲之顯明。一八九七年德國佔領膠州一事，當然從新引起日本國內之重大刺激；但在日本政界當局方面，對於德國此舉，却不引以爲奇。假如（駐德日使）Aoki四月二日之言，並非隨便而發，（譯者按，該使曾於四月二日，面勸德國外部當事，佔領中國東南一個省份，以爲日本佔領遼東半島之交換條件。）則現在日本政界當局對於德國此舉，當然不復引爲驚奇，（此固顯然易見者也。）日本之真正仇敵，以及對於日本擴充領土之真正障礙，實爲俄國。當時日人之心中，固無不如此作想。其結果怨德情形，不免爲之大減，以至於無關重要。直到一九〇二年之際，日本國內，始逐漸對德疏遠。所有報紙攻擊及政府態度，皆嘗有此痕迹發現。但此種疏遠，實有其特別原因，全與一八九五年抗議事件無關。日本著名政治家（Okuma）伯爵，係一九一四年之日本內閣首相，曾於一九一〇年春季，對着Ostasiatische Lloyd 代表，曾有下列談話，可謂極與實事相符。彼云：『德國提出反對馬關和約』

之抗議，現在業已經過十有五年。所有當時日人對德之不懌情形，現在實已早經忘去。余於近來，曾向（德國）退職大使 Holleben 言曰：東京方面早已洞悉，當時德國所從事者，僅爲歐洲政治問題，其針鋒係專對俄法兩國；縱然德國對於東亞方面亦復有所舉動。自彼時以來，德國政策早爲日本當局所了解。現在兩國經濟政治關係，竟如此發達進步，直使日本國內從前對於抗議事件的真相尙不明瞭之人，此刻關於抗議舊事，亦復忘去無餘云云。』出外更有一位德國新聞記者，曾言，一九一一年（日本）侯爵 Katuna 嘗向彼云：『日本真正政治家，對於德國參加抗議事件之舉，毫無仇視之意。蓋吾人倘若一旦反省，則知一八九五年獲得遼東半島全部一事，對於日本並無幸福可言。』誠然，吾人對於東洋政治家此種談話表示，就大體而論，其可信賴之程度，尤較歐洲政治家的談話表示爲少。而況 Okuma 伯爵更是一位著名善說與謊語之人。不過該伯爵此次談話表示，却爲 Kato 男爵所間接證明，確是真實不虛。蓋 Kato 男爵者 Okuma 內閣之外務總長也，其爲人極屬謹慎。當彼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在國會演說，以辯護日本加入世界大戰理由之際，曾列舉若干多多少少不甚明瞭之理由。但對

於馬關和約抗議事件，却一字未提。吾人於此可見，抗議之仇，對於一般社會，已無重大意義，不足以列爲證據，得着國會多數同情。我們現在知道，日本政府當時所抱之仇德政策，以及對於青島加以攻擊之舉，曾在國內方面，遇着不少反對。此外尙有一事，更足證明日本對於德國參加抗議事件，未嘗十分介懷者，即一九〇一年與一九〇二年之交，日本政府所持態度，是也。蓋其時日本對於德英日三國之關係，正欲從新加以整理；我們對於此項問題，以後尙須詳細研究。現在所欲言者，即此處又足以證明日本對德之舊日信用與親善並未因馬關抗議之影響而有所傷損，以兩國邦交成爲永遠愁悶之象也。

但德國方面當時却深信日本仇視之心，實無挽回希望。於是聽其自然，釀成種種惡果，直與一九一四年開戰以前之全局有關。究竟德國此種根深蒂固之心理，原因何在？其答案實往往令人驚訝不已。蓋此事全係英國神妙宣傳作用所致。而且此項宣傳，在世界大戰之時，更一直侵入德國各界人士腦中。縱然德國從事政治之人對於英國宣傳作用，早已知爲英國政府之最要策略，但一般德人之甘受其鼓吹也，仍然如故。此

種宣傳，自然首先利用一般人之感情作用，以使此類毫無判斷能力之『社會輿論』作彼某種政治方針與行動之響應。英國破壞德國世界地位之計畫，係從一八九六年起始有雛形，至一九〇二年以後，則漸成一種堅定形式。於是德國在東亞之地位愈進，則英國嫉使日本仇德，破壞日德關係之心亦愈急，欲達此項目的，則德國參加馬關抗議一事，實是最好材料，以使日本時常憶及舊事。昔日被人侮辱之國民自尊感情，從新鼓動，遂漸趨於實行報復一途。現在最關重要之事，只是（如何設法）盡將當時抗議事件真相掩沒，並使德國成爲抗議一役之真正發起人物，真正主要人物。因而英國從事宣傳之人，常向日人耳中，造作德國種種政策之謊語。所有東亞方面之日報外報，無不依此意旨，以使『社會輿論』受其影響。其結果，日本政府自一九〇二年將其本國運命完全追隨英國世界政策以後，對於事實真相，雖然盡知，但亦不能再將，不願再將上述英國所造謊語，阻止傳播矣。至於英國報紙書籍，從前在抗議事件大收效果以後，本來對於本國政府 Rosebery 之可悲政策，曾加以嚴厲攻擊，謂其不應坐令英國袖手旁觀，以失指導地位云云，而現刻却在大局變遷之後，利用世人易忘之習，於是不惜宣

言，當日抗議事件，乃係一種極爲可惡之暴舉，云云。關於此類英國論調，實有無數例證可舉，現在吾人僅舉一件，以例其餘。Sir Valentine Chirol，嘗任英國泰晤士報之政治編輯主任多年，曾著書一本，名爲『遠東問題』The Far Eastern Question，於一八九六年出版。其中有言：『英國方面曾於（中日）戰事初期之時，提出條陳，其目的在阻止雙方繼續敵視；而此項條陳嘗爲歐洲各國所拒絕。……最後，交戰國雙方遂將和約條件，彼此商妥。此約對於英國政治商業利益，即或未嘗直接損害，但至少關係不小，而當時英國政府却似乎站在旁邊，不願過問。反之俄法德三國則挺身立於一種地位之上，換言之，即是英國所讓出的遠東領袖地位之上。……即在後來爲時稍晚之際，英國如欲擔任獨立行動恢復和平之責，猶屬可以辦到，且無何等危險；實不應專作促使他國同來負責之工夫，而結果仍無成效。』在該書之一九四頁上，又言：『倫德國對於彼之俄法兩同事，果可以實行一種調停手段，以使彼等勿作過甚行爲，則吾人（指英人而言）對於德國之決意參加，至少不應加以反對云云。』到了一九一四年，該記者又作一書，名曰『德國與俄人恐懼』Germany and the Fear of Russia。在本書第九頁之

內，該記者却言：『即或德皇威廉並未實際嗾使俄國，阻止日本對華勝利之收穫，一如日人所懸揣深信者。但無論如何，當時德皇極願誠心與俄合作，即因此而竟下仇恨種子於日而不辭。此項仇恨種子，現因日軍圍攻膠洲之舉，可謂已達成熟之境云云。』吾人於此又可以看出英國宣傳政策所用方法為何如者：此種鼓吹既經年不斷的行使，當然易使未有政治訓練之日人，對於德國態度，充滿一種完全錯誤之觀念。此外，更因二十世紀之初，德國在華經濟文化勢力之發展，尤其是在山東方面，遂使日本政府認為此種情形，最與彼之自己（對華）政策有礙。（一如日本外務總長青木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之演說中所言者。）蓋此時彼之勁敵俄羅斯，業已於一九〇四年之役，大受創傷，已無危險，故也。雖然如此，該總長辯護日本對德宣戰理由一事，却未徵引上述『仇恨種子』而以盟國英吉利之請求相助，為宣戰最要理由。

英國此種宣傳作用，在德國方面尤較在日本方面，收效為大。據吾人素來經驗而論，世間萬事，蓋未有更易於鼓吹德人一事，以使彼等深信，彼之本國政府曾對於他國政府施以不當行為。此種德人習性，於又為英國宣傳政策之最好工具。英國宣傳所

謂『仇恨種子』、『日人永久仇敵』、『德國所行虛偽政策』、『奪去青島，爲馬關事件之報復』等語，世界上實無一國國民，其相信此等謊語之程度，有如德人之深且遍。甚至於日本人方面亦當望塵莫及。其中尤有令人驚異者，卽此種謊語，有時竟爲德人某某數輩所深信；蓋此輩對於斯役真相，照理應當有所深知者也。（原註：最令吾人驚訝者，卽（德國國務總理）Bilow 侯爵自己，亦嘗於其所著『德國政治』Deutsche Politik 一書之中，言曰：『此種（抗議）思想，可謂不幸之至。吾人只因欲得法俄兩國之秋波一盼，不惜釀成日本對德不懌與疏遠云云。』足見 Bilow 對於此項問題，亦復未從政府論點方面，加以探究，只是輕聽英國所造謊語而已。）因此，德國方面並不設法反對英國此種宣傳，而是盡力贊助此項謊語，並作極不適當之自行認錯，以使日本政治家關於彼等因受英國嗾使而探行之仇德政策，容易加以辯護。歷史上造作謊語之例，當無再較上而所舉之例，更能令人增長見識者。

倘若吾人關於德國參加馬關抗議問題之得失，意欲有所評論，則吾人應當先行研究一種基礎問題：卽德國加入海外政治舞臺，一如一八九五年所實現者，究竟是否

對於德國爲必要，爲有益是也。就吾人最近過去時間所得之經驗而論，現在大家似已得着一種信念：卽是以德國國內黨派之分裂情形，政治行動之毫無紀律，思想方面之偏重成見，民族精神之不能統一等等，根本上實不足以採行一種大規模之政策。而況德國版圖地位之危險，更使此種大政策，難於實行者乎。俾士馬克侯爵對於彼之本國民族性質，最爲深知；並嘗用明利眼光以觀將來。彼在當時，固已顯然認定上述種種事實，並加以適當處理。彼之政策目的，只在鞏固時常均在危險中之德國疆域。對於經營海外一事，因世界大勢進化之故，使彼不能不有所行動者，彼終是躊躇遲頓，直到最後始違背本意一爲而已。因此，彼對於德國參加抗議一舉，稱爲『跳入黑暗之境』（*Spring ins Dunkle*）。並謂：『若在德國舊日外交方針之下，此種參加抗議，反對日本之舉，似當不致發生；或者此事對於德國果有確實利益之時，然後始一爲之。』unter dem alten Kurs wäre die Beteiligung an der Einmischung gegen Japan wahrscheinlich überhaupt nicht erfolgt, oder doch nur gegen sichere Vorteile für Deutschland（原註：見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之『漢堡新聞』Hamburger Nachrichten）由此觀



之大凡深信德國加入海外政治舞臺並非屬於必要之人，蓋無不對於一八九五年參加抗議行動一事，加以排斥。當時德國政府對於英華兩國二三兩月之請求，應當根本拒絕；關於保持歐洲共同行動之思想，亦當加以不問；在此情形之下，德國應當一如意荷奧以及其他諸國，靜觀時局變化。誠然，德國與上述諸國，微有不同之處，即德國勢將由此失却許多因抗議事件而引起之機會，以爲本國在華重大商業發展之基，是也。至於實現德國國內殖民海軍方面人士之多年希望一層，此處尙在存而不論之列。

但在他方面，倘若有人細心一爲觀察，當時德國工業航業正在開始蒸蒸日上，發達甚猛之情形，則其勢必將發生一種思想，即是無論好歹，德國均須力謀獲得海外銷場；而海外銷場之中，又以東亞諸國爲銷路最善之地。德國在此決不應甘願受人排去，即或由此而發生戰事危險，亦在所不恤，是也。凡抱此種思想之人，當然以爲德國之不能隨便拒絕列強邀約（干涉馬關和約）一事，乃係必然之理，毫無疑義者也。此種思想盛行於（柏林）外部之中，或者只是（該部參贊）Holstein先生一人應爲例外。蓋此君對於歐洲政局以外之事，不能有所洞察，故也。最後此項思想，遂成爲中心主張。

誠然，彼輩當時因爲誤解中國時局情形之故，以爲危險之事，在乎『他國起而干涉』，不在乎『中國被人擯棄弗管之後，因而不免大怒，德國實爲最易受其損害排斥之國。』於是柏林方面決定，對於此後時局變化，不要立在後面弗管；一切行動並均照此方針以進行之。吾人若欲對於德國此種行動之是非，加以批評，則有兩個問題，必須分別觀察：第一，究竟提出抗議反對和約條件之舉，是否確係保護歐洲各國利益之適當方法？第二，假如抗議之舉，果然實行，則德國究應參與其事呢？抑願與英共同行動，退出不管呢？倘若吾人今日回顧當日之後來各種變化情形，則將毫不遲疑，對於第一問題，加以否定。蓋當時參與其事之各國，對於抗議一舉，均非十分熱心爲之。彼此皆以爲：抗議一事應由全歐（各國共同）提出。迨其後英國於最末一刻忽然退出之際，於是抗議之事遂成爲問題。（大有擱淺之勢。）直到最後聖彼得堡方面亞洲一派對此加以催迫，並獲得優勢之時，俄國乃與英國相反，自行其是。因此，抗議一事遂變成另自一種性質，換言之，已非原來所計畫之『歐洲全部共同行動』，乃是一種由俄指揮領袖，與俄關係獨大之抗議行動。』因抗議勝利之故，於是聖彼得堡方面毫無忌憚之大侯爵以及

陸海軍人派，遂驟佔優勢，大行其冒險投機之東亞政策。一般無恥之輩，相信可以踐踏他人一切權利而不顧。其結果，竟使俄國弄成如彼凶終，世間最爲危險之事，蓋無過於欲令一種活力甚富而外發展之民族，有如日本民族者，受己威力箝制。尤其是加倍危險者，過視自己能力，而輕視對方能力。向使俄國當初未嘗鑄成此種不祥大錯，則俄國至遲應於英國退出（共同行動）之後，即與日本設法諒解，以利俄國東亞地位之發展，一如俄國後來所爲者。（譯者按：後來二字，當係指日俄戰爭以後之事。）十分聰明之伊藤（侯爵）對於此種（日俄）諒解之事，殊極希望，此固彼於其後數年之間所時常表示者也。果爾，則英國遠東地位之受重大打擊，當未有再過於此者。其結果不僅東亞歷史，即歐洲歷史，亦常另成一種面目。但聖彼得堡方面既已一旦決計提出抗議，則是時德國如竟退出（共同行動），勢將對於本國在華在歐利益，均有損害。而且此種退出之舉，一如英國之例，在最後一點鐘之時，始行宣告；則德國在表面上遂不得不與俄國破裂，而偏向英國一邊。此種親英政策方針之完成，即在倫敦方面，亦復無人相信或盼待德國如此。世人常言德國一八九五年參加抗議之舉，乃是一種實際遠英政

策之表現云云。甚至於俾士馬克侯爵對於此舉，亦復認爲『顯係一種反對英國之變動』Auffällige antienglische Schwenkung。（原註：見一八九五年五月七日之『漢堡新聞』Hamburger Nachrichten）按該侯爵對於事實真相，當然不能有所聞知。彼因英國所持態度之故，而有此印象，實屬極爲自然之事。就吾人從前所述各節觀之，則知上面一般世人之揣測，實爲一種無稽之言。反之，德國果曾臨時退出（共同行動），則實際上確成一種根本親英之舉動。此種結局，甚易想像：第一，歐洲兩種同盟對峙之情形，將日益劇烈。第二，在東亞方面與俄爲敵，而又未有戰備足以抵抗。此外，更有一點應當注及者——按此點爲一切研究此項問題之人所未注及，真是可謂出人意外——即此種退出之影響，將使德國在華利益受害。此事最易看出，蓋華人對於英國所持態度，曾大爲憤慨恨怒不已，故也。其後數年之間，海軍強國在華威嚴曾經降至零點。英國當時東亞勢力嘗墜至最低之度。關於此事之實際影響，吾人當於此後再爲詳述。不過英國勢力係建築於十分鞏固基礎之上，當然不能久陷於危者。而勢力甚弱之德國，將因中國盛怒之故，十倍受危。所有政治經濟兩方，均將從此失勢無疑。俄法兩國之在中

國本來早已做作華人唯一無二的，最有勢力的友人與保鏢。本來對於中國仇德態度，早在背後力助；現在此種情形，當然更將遠較從前加增。至於英國方面，其嫉妬德國工業發展之心，當時正在開始漸成仇憎形式之際，其勢對於俄法兩國此種行動，縱不立刻附和，不久終當加入。據正月二十五日李鴻章通知德國駐津領事之言觀之，則英國公使 Sir Nicholas O'Connor 在戰事期間，卽已屢向中國大臣聲稱：所有一功列強調停之舉，只因德國態度關係之故而擱淺，云云。如此，則中國中央政府與各省官廳，對於德國商業向抱好意者，勢將不久全改面目。此外極與政治有關之借款問題，德國亦將從此被人排去，不能參加。中國方面對於德國獲得天津漢口租界一事，亦將永不允准。關於德國欲得一個海軍根據地一層，則因俄國在中國北方所抱仇德態度之故，毫無希望；而在中國南方則更不能說及此事。所有德國在華一切發展機會均被他人束縛之損失，決非日本空空洞洞友誼所能補償。至於德國此後縱抱謹慎知足態度，而時局前途之發展，終不能有利於德。蓋英國仇德計畫，始終不能有所更改。除非德國決定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地之英國商業，均不加以競爭，並自願在東亞方面，擔任抵抗俄國勢力。

之工具；（或可一使英國仇德政策爲之變更。）因此之故，一旦果有抗議行動之舉，則德國除參加外，實無他途，此固毫無疑義者也。其應當研究者，只是如何盡力，以使此項參加，形成有利之舉而已。因實行此項抗議的手續不善，以及其他種種情形（關於此種情形，余將於後面敘述）之故。於是遂將此舉效用大損。如果英國以其消極態度會得大效，則德國方面亦無依樣模倣之必要。Post hoc Propter hoc——當然此種見解固與德國一般人所懷意見相反。——當時英國政策之動搖不定可嘆可悲情形，吾人固嘗見之矣。嫉妬，恐懼，不知足，種種原因，遂使該國政策不能下一決定。假如當初，抗議一事，能照原定計畫，爲英國領袖下之一種歐洲各國共同行動，以保持（東亞）大陸現狀爲宗旨；則英國所不願見之局面，當可根本阻其發生。而英國計不出此，於是時局之轉變，遂大出彼之意料。俄國由此獲得意外大洋勢力之擴充。此種勢力，決非英國所能再行鏟除；假如俄國能够洞察大局動力所在，立與日本諒解，不必等到十五年以後始行爲之。（譯者按，此指一九一〇年左右，日俄合作之事而言。）輕率與驕傲，遂使俄國失却最大機會。只因此種緣故，英國乃得以成功，決非出於英國自己先見之明也。吾

人於此又可以看見英國政策之僥倖，乃他國自己愚蠢使然，而英國政策自身則實毫無理性可言。

至於俾士馬克侯爵對於此次大規模之舉動，係立於反對地位，已如上面所述。但彼嘗坦白自認：彼對於此次行動之理由與計畫，毫無所知；因此，彼實不能下一確定判斷，云云。所有德國許多小評論家，實應以此偉大評論家（之言）為模範。